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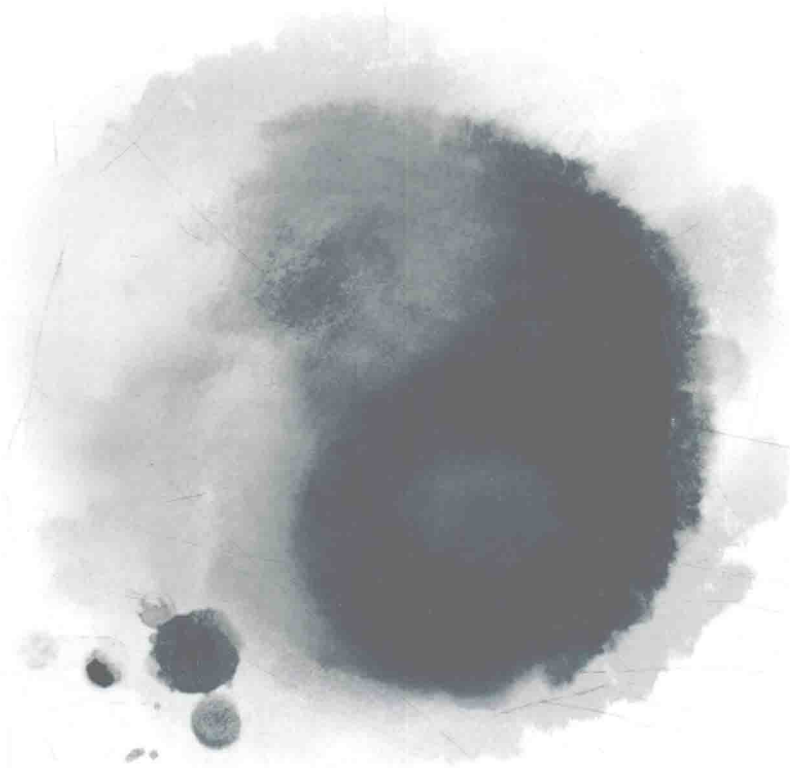
本书受“北京高等学校青年英才计划项目

(Beijing Higher Education Young Elite Teacher Project) ”资助出版

超越语言的^的文学

韩国学者视角下的中国文学

原著 ◎【韩】全炯俊 编译 ◎ 杨 磊



世界科学出版社

超越语言的文学

韩国学者视角下的中国文学

原著 ◎【韩】全炯俊（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教授）

编译 ◎ 杨 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翻译团队：

杨 磊（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副教授）

李大可（博士，山东师范大学 副教授）

金鹤哲（博士，哈尔滨工程大学威海分校 副教授）

苑英奕（博士，大连外国语大学 副教授）

宋香庆（在读博士，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3 by Jeon Hyungjun

All rights reserved.

First publish in Korea by Moonji Publishing Co.,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超越语言的文学：韩国学者视角下的中国文学 / (韩) 全炯俊著；

杨磊编译. —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012-5111-7

I. ①超… II. ①全… III. ①中国文学 - 文学研究

IV. ① I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304501 号

书 名

超越语言的文学——韩国学者视角下的中国文学

chaoyue yuyan de wenxue——hanguo xuezhe shijiaoxia de zhongguo wenxue

作 者

【韩】全炯俊 / 著 杨 磊 / 编译

责任编辑

王瑞晴 蔡金娣

文字编辑

王 超

责任出版

王勇刚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电 话

010-85112689 (编辑部)

010-65265923 (发行部) 010-85119023 (邮购电话)

网 址

www.ishizhi.cn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本印张

700 × 960 毫米 1/16 10 印张

字 数

158 千字

版次印次

2015 年 12 月第一版 2015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111-7

定 价

2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 PREFACE

笔者以论文形式撰写的有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第一篇文章是1984年12月发表的《鲁迅小说和“五四运动”》。当时在出版界崭露头角的田艺园出版社正在踌躇满志地编辑发行季刊杂志《外国文学》，吴生根、李诚元、安三焕三位编辑委员企划了名为“历史和文学认识”的特辑，委托正在攻读中文系博士的笔者负责中国文学部分。那时候的韩国，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凤毛麟角，连搜集最基本的资料都非常困难，所以笔者是怀着一种在无边原野上茫然寻路的心情写出的文章。出版社位于首尔江南地区，记不清有一次是去校稿还是去取出版好的杂志，那一天风雪漫天的江南晚景与彼时的茫然心情至今历历在目。

现在和那时的情形相比已经有了巨大的改观。韩国国内的论文数量众多，更有数不清的论文从中国蜂拥而至。美国、日本、欧洲等地用各种语言撰写的论文也层出不穷。这些资料中的大部分都比较容易获取。但是，面对如此数量巨大的成果，笔者感受到了另一种茫然，是一种与28年前相比更为深沉的茫然。之前的茫然里还多少带有一些浪漫色彩，但现在的茫然中却好像有的只是枯竭和疲惫。

笔者至今出版过三本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专著：分别是1996年的《对现当代中国文学的理解》和1997年的《现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理论》，还有2004年的《东亚视角下的中国文学》。前两本是以韩中两国文学的同质性认识和在这种认识之中孕育而生的彼此认同意识为基本原理创作的。第三本则是基于韩中两国差异性扩大的新认识，力图平衡地探索同质性与差别性。前者的同质性是在与西方——这个“他者”之间的关系基础上得以成立，后者的差别性则是源于东亚内部矛盾的可能性和潜在性。

首篇论文发表28年后出版的这第四本学术专著则把焦点放置于“文学”。

什么样的文学？不是依存于某种语言的某一个国别文学，而是超越限制、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这种“文学”是无法被直接认知的。我们能直接认知的仅仅是国别文学而已。“文学”，超越国别文学，以一种对于它的直接认知不可能实现的方式存在，同时又使得每一个国别文学成为“文学”。如果没有“文学”，每一个国别文学都无法成为文学。这个“文学”就是本书能够把韩国文学和中国文学视为具有同质性的依据，也是本书命名为《超越语言的文学》的原因。

对于“中国文学”这个提法，笔者也需要表明一下自己的想法。在给上一本著作起名字时，笔者最初并没有使用“现当代中国文学”或“中国现当代文学”，而是命名为“中国文学”。中国文学研究界的习惯是把古典文学（或是前现代文学）称作中国文学，现当代文学不称中国文学而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笔者认为应该把这两个概念对调：称现当代文学为中国文学，把古典文学称为中国古典文学。与此相关的问题具有很大探讨空间，但在此处就不做展开了。

整理书稿的时候发现经常引用几位人士的论述。从出生时间顺序来看，有德国的理论家瓦尔特·本雅明、中国小说家莫言、香港出生的美国学者周蕾等。有的为探讨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有的则证明了笔者观点的正确性，还有的提供了研究对象、批评对象、讨论对象，没有他们，本书也无缘问世。在此真心地向他们表示谢意。此外，还需要对中国诗人北岛和作家苏童表示感谢。不久以后，会用《论北岛》、《论苏童》的形式回报他们。此外，还需要向韩国国内以及中国大陆、台湾地区、香港地区、新加坡、日本、美国、澳大利亚等地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界的各位同仁们表示谢意。当然，最应该表示感谢的还是阅读这本书的各位读者。

全炯俊

二〇一三年四月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部分 超越语言的文学 /1

韩中一中韩译者的任务 / 3

韩中文学相遇的意义所在 / 10

由两个女性的归乡所考察的故乡含义

——黄春明的白梅和黄皙暎的白花 / 17

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韩国的《狂人日记》 / 22

通过王蒙和金芝河，重读《狂人日记》 / 28

第二部分 再次从文化走向文学 /45

文化间翻译一小考——同周蕾的对话 / 47

东亚内部的文化间翻译

——黄春明小说与韩国的话剧和电影 / 60

文字文化和视觉文化

——文化研究的鲁迅观考察 / 70

对文学和电影相互性的考察

——《活着》和《红高粱》的原作与电影 / 87

第三部分 和中国文学的对话 /103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文学的新状态与新阐释（1）

——先锋派及新写实小说与新状态文学的关系 / 105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文学的新状态与新阐释（2）

——从新阐释的观点看新时期文学史与新状态文学 / 120

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相关的几个问题 / 138

底层叙事和中国文学新局面 / 152

第一部分

超越语言的文学

韩中—中韩译者的任务^①

首先需要向各位说明的是本文题目的由来。在坐有的学者可能已经发现,这个题目是根据瓦尔特·本雅明的文章《译者的任务》而命名的。本雅明,1892年出生,1923年翻译了波德莱尔的《巴黎即景》(《恶之花》第2部),《译者的任务》一文便是这本书的序言。^②在今天这样一场探讨韩中—中韩翻译的研讨会上,之所以引入德译法的案例是事出有因的。接下来便从原因入手开始本次论文阐述。

美籍华人文化研究学者周蕾(Rey Chow)教授在其著作《原初的激情》(1995)一书中就翻译问题做过令学界瞩目的分析,对世界各地的中国学领域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一部分研究当中引用了本雅明的观点,其引用的核心内容如下:

那(真正的翻译—引用者)主要是通过句法翻译中的 *Wörtlichkeit* 实现。也就是说,译者的第一要素不是句子,而是单词。如果句子是横亘在原文语言前那面墙的话,则是因为 *Wörtlichkeit* 是 *Arkade*。^③

本雅明文章的英文译者哈里·佐恩(Harry Zohn)将原文中的德语单词 *Wörtlichkeit* 翻译成了英文单词 *literalness*。^④周蕾据此认为 *literalness* 的译法对

①2011年1月8日,在北京大学举办的中韩翻译学翻译教学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稍许修改和补充。

②1914年本雅明开始翻译的《恶之花》,但是由于工作无法持续进行,在9年后的1923年才出版了译本。

③Walter Benjamin, *Illumination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7, P.59. 本段引文根据韩文翻译而成。本书同时引用中国国内学者的翻译供读者们参考:“那(真正的翻译——译者注)主要可以通过句法的直接转换达到,这种转换证明词语而非句子才是译者的基本因素。如果句子是挡在原文语言前面的那堵墙,那么,直译就是拱廊”(陈永国译,《译者的任务》,《翻译与后现代性》,陈永国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P.10)。

④笔者决定把 *Wörtlichkeit* 翻译成韩国语中的汉字词“逐语性”或者“逐语的”。

于 Wörtlichkeit 具有替代补充 (supplement) 的意义。Literalness 这个英文单词, 除去有“逐语性”的意思之外, 还有第二层意思: 表面的、低劣的、简朴的, 但是德语原文 Wörtlichkeit 却没有第二层含义。周蕾认为: “由此, 哈里·佐恩所做出替代填充式翻译便可以使本雅明自身所称的原文的‘意图’这种形式隐藏在原文的一种内容更加明确化。重要的是, 原文的‘意图’只以替代补充、附加的形式 (因为是已翻译好的), 也是可以把握的。”^① 总之, 原文是自我分延 (self-différance), 翻译即替代补充, 这是周蕾的核心命题。(这个命题可能会引起争议, 在此将不做探讨。)

周蕾把这个命题运用于文化翻译而不是语际翻译。翻译的问题如果仅仅局限于语言之间, 那么便是依附于语言文本特权化的现代西方制度, 这样的翻译在欧洲以外地区作为欧洲殖民主义最重要的遗产保留了下来, 这是周蕾否定语言间翻译的原因。在语际翻译中, 原文和翻译之间的不平等的等级关系无法颠覆, 原文地位崇高、价值稳定。周蕾所说的文化翻译, 首先是消除原文稳定的价值; 其次是追求广度而非深度, 涵盖从传统到现在, 从文学到视觉, 从精英学者文化到大众文化, 从本土到外国, 再从外国到本土等变化的宽泛范围。当然, 在这中间, 周蕾投入大量注意力的部分是作为民族志的现代中国电影。现代中国电影是对中国文化的翻译, 这个翻译既是 Wörtlichkeit, 也是 Arkade。这个 Arkade 中, 以逐语、表层的方式展示着现代的‘原初的存在’ (现代中国电影的女性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个原初的存在, 一方面暴露了中国传统的糟粕, 另一方面在戏仿西方的东方主义。以上即为周蕾的主要观点 (这些观点也有可能引起争议, 对此亦不做讨论)。

周蕾把本雅明关于翻译的论述作为其将翻译扩大到文化之间的论据。与此相比, 印度的文化研究者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 (Tejaswini · Niranjara) 在其著作《为翻译定位》(1992) 中虽然也引用了本雅明的翻译理论, 不过是将其限定在语际翻译。尼南贾纳反对同化翻译, 主张异化翻译。可以把这视为是以本雅明 Wörtlichkeit 概念作为根据的一种新直译主义。在把第三世界的文本翻译成西方语言时, 尼南贾纳期待异化翻译能保存和突出第三世界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 把这种翻译策略叫作“阻止沟通”(退出沟通)。虽然周蕾认为尼南贾

^①Rey Chow, *Primitive Passio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 1995, P.186. Rey Chow 著, 郑在书译: 《原初的激情》, 移山出版社, 2004 年, P.278。

纳成功地扭转了东西方的权力等级关系，但又批判她没能逆转原文和翻译之间的权力关系，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尼南贾纳排斥了文化间的翻译，只局限地运用了语际翻译。虽然对此笔者更想站在尼南贾纳的一方，但是如果将视野再拓展一些的话，无论是对于周蕾的观点，还是尼南贾纳的观点，恐怕我们都无法轻易表示首肯。

笔者曾对这个问题做过细致的对比研究^①，在此仅仅简单地阐述一下要点。以周蕾或尼南贾纳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将文化间不平等关系看成是一种普遍现象。也由此，语际翻译只把第一世界的文化和第三世界的文化之间的翻译作为议论对象；文化翻译则将例如文学—电影的关系或历史—记录的关系作为殖民—被殖民或者是原文—翻译的不平等关系来处理。即便他们之间的观点和立场有或多或少的差别，但都是处在文化不平等的问题框架中。这个问题框架只在一定的范围里才成立，但同时也排除这个问题框架之外的问题。即，排除属于非不平等的对等关系里的翻译。如果将其排除在外，其结果就是第一世界内部的翻译或者第三世界内部的翻译被忽视，例如，文学和电影各自所具有的相对自律性的世界会被删除。像这样，孕育第三世界文化产物的文化内部的观察视角会消失，而如果仅仅通过同第一世界的不平等关系来进行考察的话，则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虽然在文化不平等问题框架的设定中本身具有肯定意义，但赋予它普遍具有普遍价值的一刹那，它自身就会完全变质成为一种西方中心主义。这是不是意味着第三世界文化都无法独立存在呢？这一点，在不同文化类型间的翻译里也是一样的。很多东西只有在将两种类型放置于平行关系看待时才有效，如果将其置于不平等的关系中去考察，则会消失在我们的视野中。更进一步来说，非西方和西方的关系绝不是全都不平等的，同理，非西方的内部关系和西方内部关系也绝不只是平等的，这些都会使得问题的考察变得更加复杂。

——如果将韩中—中韩翻译同上述问题置于同样的框架中去讨论的话，其特征也是很明显的，是西方世界之外的两种语言，即，处在平行关系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而且韩国和中国同处东亚及汉字文化圈的范围内，具有极近的亲缘关系。这便让人联想到以《译者的任务》作为序言的本雅明把法语翻译成德语，

① 韩国中国语文学会：“后殖民主义的翻译理论和东亚内部文化间的翻译”，《中国文学》第51号，2007.5，PP.99-100 参考。

是西方世界内部的处于平行关系两种语言之间的翻译。而且，法国和德国都位于西欧，具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此说来，韩中一中韩翻译中该去如何认识本雅明的 *Wörtlichkeit* 呢？这个认识是不是会比后殖民主义更符合本雅明的本意呢？

从韩中一中韩翻译的角度来看本雅明的文章，首先值得关注的是本雅明对于自古以来就占据翻译争论焦点的直译还是意译问题表现出了鲜明的态度和立场。这和源自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新直译主义有关。本雅明曾经引用鲁道夫·潘唯兹（Rudolf Panwitz）作品《欧洲文化的危机》（1917）中的一段话：

我们的翻译，甚至优秀的翻译，都是从一个错误的前提开始。它们想要把印地语、希腊语、英语变成德语，而不是把德语变成印地语、希腊语、英语。比之对外国作品的精神，我们的翻译者对本族语言的运用推崇备至……译者的根本错误在于，他维护了本族语言碰巧所处的状态，而不是让他的语言深受外国语言的影响。尤其是在从距本族语相当遥远的一种语言翻译时，他必须回溯语言本身的基本因素，渗透到作品、形象、格调趋同的那一点。他必须借助外语发展和深化自己的语言。一般说来还没有认识到这在何种程度上是可能的，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对语言加以改造，语言与语言的区别何以相似于方言与方言的区别。然而，最后一点只有在人们认真对待语言而非轻描淡写地对待语言时才是真实的。^①

如果把潘唯兹的主张称作“外语化”翻译的话，它与尼南贾纳的“异化”翻译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虽然尼南贾纳的异化翻译目的在于在所谓不平等关系的特定范围中抵抗不平等关系，而潘唯兹的“外语化”翻译则是为了在一般的范围中扩大和深化本国语言。比如，同样是把汉语翻译成英语，尼南贾纳的“异化”翻译可以保存和凸显中国文化的差异和多样性，而潘唯兹的“外语化”翻译（还有，同意这种翻译的本雅明逐字译）则可以扩大和深化英语。笔者认为，韩中一中韩翻译，有必要从潘唯兹和本雅明的角

^①瓦尔特·本雅明：《恶之花》，P.61。潘星完编译：《本雅明的文艺理论》，民音社，1983年，PP.331-332。本书采用《译者的任务》中译本，陈永国译，《翻译与后现代性》，陈永国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P.11中的译法。

度进行探讨。^①

将中国文学翻译成韩国语，韩国读者（既包括一般的读者、出版社，也包括像大山文化财团这样的翻译赞助机构）倾向的是“归化”的翻译。从大山文化财团和韩国文学翻译院的反应看来，看得出对韩国文学汉语翻译也更倾向于“归化”的翻译。在中国好像也一样。但是本雅明教给我们的正是对归化翻译反思的必要性。有趣的是，与本雅明大致生活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年龄相近的中国评论家也发出了相似的主张。比本雅明早 11 年（1881 年）出生的鲁迅在 1930 年（比本雅明晚 7 年）写的文章《“硬译”和“文学的阶级性”》中，也对外语翻译和汉语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讨论，主张“逐字译”。虽然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影响关系，所处环境也各不相同，但主张相似，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但是，本雅明所说的译者的任务指的是本国语言扩大、深化之上的内容。

译者的任务包括发现趋向语言的特殊意图，这种意图在那种语言中产生原文的共鸣^②

上文中的“意图”，其实在上面的引文更前的部分就进行了如下的说明：

相反，语言间一切超历史的亲缘性都包括这一点：在作为整体的每一种语言中，所指的事物都是同一个。然而，这同一个事物却不是单独一种语言所能表达的，而只能借助语言间相互补充的总体意图（intention）：纯语言（die reine Sprache）。^③

① 施特凡·格奥尔格 (Stefan George, 1868-1933) 对波德莱尔翻译和本雅明对波德莱尔翻译就具有可比性。身为诗人的格奥尔格，其翻译为意译，而本雅明的翻译为直译。维尔纳·富尔特 (Werner Fuld) 对格奥尔格的翻译评价甚高，却对本雅明的翻译给予否定。（《瓦尔特·本雅明：他的生平和时代 Walter Benjamin Zwischen den Stühlen: Eine Biographie》，李基植、金英玉译，文学与知性社，1985 年，PP.163-165 参考）。富尔特认为本雅明的波德莱尔翻译索然无味，甚至怀疑他是不是对于法语原著理解不够深入下进行的翻译、在德语圈里必然无法被认可和长久的阅读。（同上，P.169 参照）。即使我们对认同富尔特的评价，也还是有必要对潘唯兹和本雅明视角的重要性加以重视。因为理论和实际往往是不一致的。

② 本雅明：《恶之花》，P.57。潘星完编译：《本雅明的文艺理论》，P.327。此处所谓“正在翻译的语言”，是格奥尔格在把法语翻译成德语的时候，对德语的指代。本书采用《译者的任务》中译本（陈永国译，《翻译与后现代性》，陈永国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P.8）中的译法。

③ 本雅明：《恶之花》，P.54。潘星完编译：《本雅明的文艺理论》，P.324。本书采用《译者的任务》中译本（陈永国译：《翻译与后现代性》，P.6）中的译法。

此“意图”——“纯粹的语言”也可以被称为是下面所说的“真正的语言”：

其原因（诗人和翻译家的意图不一样的原因——引用者）是译者把许多种语言整合成一种真正语言（einen wahren）的伟大母题而充斥于他的作品。^①

上面的引用文后就是我们最初引用的句段，让我们再来看一遍吧。

那（真正的翻译——引用者）主要是通过句法翻译中的 Wörtlichkeit 实现。也就是说，译者的第一要素不是句子，而是单词。如果句子是横亘在原文语言前那面墙的话，则是因为 Wörtlichkeit 是 Arkade。^②

所谓“纯粹的语言”的神秘主义概念，我们理解起来难度非常之大。本雅明用了很多方式使其更容易被理解，其中给笔者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下面这段话：

一件容器的碎片若要重新拼在一起，就必须在极小的细节上相互吻合，尽管不必相互相像。同样，译文不是要模仿原文的意义，而是要周到细腻地融会原文的指意方式，从而使原文和译文成为一种更大语言的可辨认的碎片，恰如容器的碎片是容器的组成部分一样。^③

相当于“摔坏前的容器”的“更大的语言”是不是就是巴别塔之前的语

① 本雅明：《恶之花》，P.57。潘星完编译：《本雅明的文艺理论》，P.327。本书采用《译者的任务》中译本（陈永国译：《翻译与后现代性》，P.8）中的译法。

② Walter Benjamin, *Illumintione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7, P.59

③ 本雅明：《恶之花》，P.59。潘星完编译：《本雅明的文艺理论》，P.329。本书采用《译者的任务》（陈永国译：《翻译与后现代性》，P.9）中的译法。

言呢？^①根据巴别塔的故事，语言就像打破的容器碎片一样，分裂成了无数的民族语言。由此笔者想到了在民族语言中捆绑的民族文学。笔者在2007年“第一次韩中作家会议”的主题演讲中进行了阐述：并不是国家里存在个别的语言，而是个别的语言之后，或者之下存在着国家和民族，文化和历史一样等同的复合要素。如今成为论议焦点的殖民/被殖民问题也似乎应该被纳入到这个复合要素中，超越个别语言制造的界限，是否能到达文学的普遍性呢？不管是否可能，这与本雅明所说的达到纯粹语言基本完全重合。本雅明明确表达了虽然翻译中除了文学翻译外还有很多其他类型，但通过翻译来接近纯粹语言的最佳途径是文学翻译。本雅明不只翻译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第2部，还把荷尔德林翻译的索福克勒斯作品作为一个典型范例提出来，本雅明认为：“（原文）语言的质量和区别度越低，其作为信息的程度就越大，对于翻译就是愈加贫瘠的土地……”^②对于本雅明的话，笔者是反对的。即原文语言带有的质的价值和个性越高，它传达的内容就会减少，所以为了翻译更具有生产性的就是文化。（根据本雅明的信仰，那样的文本中最高的就是《圣经》）。通过本雅明的翻译，就像到达纯粹语言梦想一样，我们为什么不通过韩中—中韩文学翻译，来梦想到达文学的普遍性呢？

笔者想把这种意义上的文学普遍性命名为“超越语言的文学”。使人们认知到以民族语言乃至用个别语言单位、摔破的碎片状态存在的“文学”，即个别语言的文学是更大的文学、超越语言的文学碎片，这个任务是不是应该成为文学译者最为重要的任务呢？借助这个问题的引出，可以概括出今天论文发表的全部内容。

①《论原初语言和人的语言》（1917）中，本雅明对亚当和夏娃堕落前的分裂前的语言进行了分析。堕落前的语言既是创造的语言，同时也是认知的语言，而堕落后，创造的语言和认知的语言却被分裂开了。（Werner Fuld, 李基植、金英玉译，前书，p.166参考）如果把把这个概括为“同一性（创造—认知）的语言对分裂（创造—认知）的语言”，那么，《译者的任务》里的论述，也可以概括成“纯粹语言（一个大的语言）对个别语言（碎片）”。所以笔者把这个纯粹的语言表述为巴别塔之前的语言，这样的表述，已经在雅克·德里达论本雅明的《巴别的塔》中有所提及。但是，本雅明的本意，如同维尔纳·富尔特的说明一样（同书，p.167参考），在所有碎片重新组合到一起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救赎的时间。正因为如此，维尔纳·富尔特主张：“《译者的任务》对于了解本雅明哲学的思想是非常有益处的，但对翻译质量的评价却没有什么帮助”（同书，pp.168-189）。笔者认为，虽然像富尔特说的，对翻译质量的评价可能起不到什么帮助，但在翻译基本的角度来看，对多样的思维可以起到一定作用。在本雅明的翻译论里，许多人试图发现考察的线索，因此便产生了各种研究和讨论。

②本雅明：《恶之花》，P.61。潘星完编译：《本雅明的文艺理论》，P.332。本书采用《译者的任务》（陈永国译：《翻译与后现代性》，P.11）中的译法。

韩中文学相遇的意义所在^①

在韩中两国作家第一次对话交流会议中，由我来作主题演讲实在是令我既荣幸又汗颜。也可能是因为我身担韩国文学评论家和中国文学研究者的双重角色吧，也就是说，我以成民烨这个笔名在评论韩国文学的时候一直在参考中国文学，而以全炯俊这个本名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却又不断地参考韩国文学，尽管我的这种方法还不娴熟，但可能正因为我是一个在自身内部进行韩中两国文学对话交流的人，所以大会才把这个主题演讲重任托付给了我。首先，向使我感到荣幸又汗颜的韩中两国交流活动企划者——金柱演、洪廷善、陈思和王安忆四位先生（当然，陈思和先生也和我一样担当了重任）以及来自韩中两国的作家们致以谢意。

今后十年间要举行的韩中作家会议的主题将选定为“和平”。许多词汇在实际应用中常被扭曲，尤其是一些美好的词语，“和平”一词也不例外。权力或者既成秩序常常用这个词来要求弱者顺从或者屈服，而弱者又往往用这个词来为顺从和屈服辩解。这样以来的“和平”，从表面上看是“和平和睦的状态”，但其实则不过是对矛盾的掩饰和对问题的逃避。文学并不是为那种假和平而服务的。反而应当说，文学正是要暴露那些假象、直面那些矛盾和问题。正是从文学的暴露和直面是探索真正和平可能性的这一点上，文学与和平相互联系了起来。比如，所谓的和平总是在与矛盾并现时才具有意义。“矛盾虽坏但和平却好”这个命题是不成立的。反倒应该说，掩盖矛盾的和平更坏，而为了实现和平而敢于和矛盾正面交锋的东西才是好的。

和平这个词常用来描述国家间的关系，但在描述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层面，比如阶级间或是阶层间的关系时也常用到和平一词，并且它在个人内部也是可

^①2007年4月9日上海举办的第一届韩中作家会议的主题演讲，《文学和社会》2007年夏刊登载，有少许修改和补充。

以使用的。第一届韩中作家会议将焦点置于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层面，将主题定为“创伤与愈合”。不管是世界的哪个角落都会有这样的国家，但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韩国和中国，对于许多人来说，这几十年是个人遭受社会给予的创伤并力图治愈它而度过的一个备受煎熬的过程。两国的历程固然不尽相同，但可以说大同小异。回溯历史便可发现，两国在进入近代之后多有类似，而在之前的封建时代也差异不大。但今天我要讲的仅限于近几十年的时间段内。顺便提一下，“创伤与愈合”是一种医学概念。鲁迅先生在开始从事文学的时候，准确讲在开始文化运动的时候所思考的“病态的国民性及其治疗”也是一种医学概念。但鲁迅先生所医治的对象具有消极否定性的特征，而我们所说的“创伤与愈合”中的治愈对象，或者准确说是治愈的主体，我们将其设定为一个积极肯定性的概念。我个人认为这个对象或者主体也应该反省到这一点，在这里有必要对此进行强调。

韩国最近几十年政治方面的军事独裁和反共意识形态，再加上随着经济的城市化、工业化所招致的社会矛盾日益加重，这一切都以给个人造成创伤为特征。1960年，推翻自由党独裁政权的4.19革命最终失败、朴正熙政权开始实行其漫长军事独裁的那一场面，1980年光州民主化运动转变成流血事件、军事独裁肆无忌惮的场面，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产生的工人农民的牺牲和小市民的苦恼等尤其引人注目。韩国文学并没有掩盖这些创伤，而一直以来致力于对其进行无情披露。掩盖创伤便不可能得到治愈。打个医学的比喻来说，病人有疼痛的感觉才说明他还活着，疼痛是能使其治愈的根据。在韩国文学内，暴露创伤往往也是同掩盖创伤进行的正面交锋，所以在政治上还遭受过弹压，但韩国的作家们在种种威胁面前却表现出了大义凛然的风采。1970年诗人金芝河在长诗《五贼》中披露权力的不正当性、描述民众的苦痛而受狱中之苦，80年代众多年轻文人们带着“都这么写了，你们还不把我抓走”的心情，提升了发言的尺度创作出了一批具有挑战性作品。许多文学作品被定为禁品，尽管如此，文学抵抗的情绪却是日益高昂。为了避免误解，我想请大家同时注意，当时的大多数文学写作在艺术或美学高度上以及对形式的追求等方面也是十分出色的。70、80年代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者两个对立轴将文学界的理论划为了两半，而被划归为现代主义小说家的赵世熙以美学文体展现了雇工和雇用主之间的尖锐矛盾。而被称为现实主义小说家的黄皙暎，对民众的苦痛表现得淋漓